

# 引言

## 1 问题的提出

通货膨胀是纸币制度下一种灾难性的社会瘟疫，也是战后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地区）〔本书所提及“发展中国家”若牵涉东亚时均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发展中国家（地区）”请读者注意〕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特别是 70 年代中期和后期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通货膨胀，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带来深重的灾难，使这些国家（地区）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与富国的差距迅速拉大，有些国家至今尚未摆脱通货膨胀的阴影。

尽管战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对通货膨胀都无一幸免，但各国通货膨胀发展的结果却存在很大的差异：一些地狭人多，原先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或地区（如东亚的韩国和台湾地区）迅速地克服了通货膨胀，经济重新恢复稳定增长；而一些资源丰富，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如拉丁美

洲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却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停滞中,至今尚在苦苦挣扎。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发展中国家(地区)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践有哪些成败得失?发展中国家(地区)能否实现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这双重目标?这些均是引人深思的问题。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通货膨胀是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遇到并且今后可能还会遇到的重大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反通货膨胀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2 本书的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1) 基本思路

本书的思路即主要篇章结构大体上是这样安排的:

第 1 章介绍代表着战后发展中国家(地区)发展结果的两个典型——东亚(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与拉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通货膨胀概况。

第 2 章对这两个地区的通货膨胀成因、类型、程度、经济条件等一般状况进行比较,并与我国作对比,目的是为后面关于对策比较的诸章提供借鉴的依据。

第 3 章是关于发展战略对通货膨胀的发生与发展结果的影响机制探讨。迄今为止,许多学者都把东亚与拉美通货膨胀发展的巨大反差归咎于拉美国家的经济结构失衡、财政赤字和外债政策的失误。笔者认为,这些均属现象,上述问题的产生均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失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首先比较了两个地区的发展战略的差异——在完成初级进口替代后是否

经过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阶段，以及在提高出口结构的层次上所作的努力不同。接着，本书运用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等理论，着重考察了不同发展战略对一国的财政收入的增加、资金积累速度的提高、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经济效益的提高所产生的不同效应，从而证明了发展战略选择的正确与否，对总供给能力这一决定通货膨胀转归的关键因素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发展战略的不同是造成这两个地区通货膨胀发展差异的最根本原因。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以科技进步为基础，发展外向型经济，对于防治通货膨胀尤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它可以减轻就业对稳定通货的压力，缓解资金短缺，增加有效供给，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经济抗御通货膨胀的能力。我国目前外向型经济的层次还较低，进出口核心结构还是出口附加值较少的初级产品和技术含量低的制成品换取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的制成品。这种贸易结构的最大缺陷是造成价值向国外转移，从而降低了国内供给能力和资金积累能力，无助于改善财政状况，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构造企业技术进步机制，促进产业和出口结构的升级。书中最后指出外向型战略的局限和实施的困难，并简要地提出相应对策。

第 4 章对在上述国家（地区）曾产生过较大影响的 3 种通货膨胀理论（货币主义、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的主要学术观点及其政策主张，进行分析、比较和评介。笔者认为，货币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论证并坚持稳定通货这一政策主张，至于其对通货膨胀成因的分析则失之于肤浅，所提出的治理政策亦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地区）。结构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但其治理对策偏重长

期结构调整而忽视了短期需求管理，故有局限性。新结构主义关于惯性通货膨胀形成与维持机制的分析，对于我国防治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以及防止、治理通货膨胀引发滞胀均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其治理对策的中长期效果仍不明显。

从第 5 章开始，分别比较了两个地区的各种反通货膨胀政策，并从完善我国反通货膨胀政策体系的现实需要出发，分析他国（地区）经验引入我国实践的前提条件、体制背景和适用的程度。

第 5 章是货币政策比较。首先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对货币稳定的影响。接着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政策工具及配套模式、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等 3 个方面考察了两地的异同，指出其可供借鉴之处。本章第 5 节则批驳了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观点，最后，探讨了在短缺与资源结构性闲置并存的条件下，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解决结构矛盾的可能性，指出其可行性是很小的。

利率政策是反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工具，第 6 章通过对两个地区的利率政策的横向比较，指出必须逐步放弃低利率政策，实现利率自由化。但鉴于高利率政策的负面效应以及我国企业的高负债经营现状，我国必须主要靠降低通货膨胀率来实现正的实际利率，只有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才能让利率与物价指数挂钩。

第 7 章在比较两地财政政策 and 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可供我国借鉴之处，指出发展中国家（地区）要抑制通货膨胀，必须摒弃赤字财政政策，处理好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行宽税基、低税率的税制模式，以税制改革为突破口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指出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必须采取财政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的模式，并在控制总量的同时放松结构

和适当放开直接融资市场。

第 8 章，收入政策比较。首先比较了价格工资管制与放开的利弊得失，概括了选择收入政策的依据。接着对我国价格改革思路的演变过程进行反思，对价格改革每每加剧通货膨胀这一难点问题的成因和对策作了探讨。指出市场主体缺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必须调整价格改革的思路。本章最后一节对收入指数化政策作了实事求是的评析，指出非到万不得已，不宜用收入指数化作为通货膨胀中收入补偿模式。

第 9 章，产业政策比较。产业政策是对付结构型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本章首先比较了两地的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指出产业政策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且随着市场的完善，应逐步淡化政府的行政干预。接着比较了两地的农业政策，并重点围绕如何提高我国农业比较利益，以解决农业发展滞后问题进行了讨论。

鉴于国有企业低效益和对其补贴是造成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本书特辟专章讨论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在第 10 章中分析了两地国有企业存在的共同问题、其原因及改革的一般趋势。在此基础上，联系我国实际，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我国国有企业效益差的问题，不能把原因都归咎于国有制；着重讨论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问题，认为经理中心制是解决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较好办法；另外，调整国有资产配置领域是现阶段搞好国有经济的又一重要途径。

前面几章都是从国内均衡的角度探讨通货膨胀的对策，鉴于当今世界上通货膨胀会在国际间传递，因此在第 11 章将目光移到对外经济政策上来。本章首先探讨了通货膨胀条件下汇率制度的安排，指出对国际收支赤字和通货膨胀并发的发展中

国家（地区），蠕动钉住汇率制不失为一种可供考虑的选择。接着对外债政策进行比较，指出外债规模过大、债务结构不合理是导致拉美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但从根本上说，这是发展战略选择不当的后果。最后，对如何借鉴韩国的外债政策提出看法。

## （2）本书研究方法

本书运用的最主要方法是比较法。所谓比较法，就是对照各个对象，以揭示它们的共同点和差异的一种逻辑方法。“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只有把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作比较，才能辨异求同，鉴别出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差异点和共同点，才能打开思路，认识这个事物的特殊属性和一般属性。

与其他逻辑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等相比，比较法有其特点，归纳法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演绎法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比较法则是在两个（类）或若干个（类）特殊事物之间进行分析比较的方法，是从特殊到特殊，它固然可以发掘事物之间的共同性，但尤其能鉴别事物的特殊性，因此在科学研究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但是，比较法也有它应用的条件，首先，它要求作为比较的对象、特殊事物必须既有相似性的一面，又有相异性的一面，而且这种相似性和相异性还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否则不是增大比较的局限性，就是失去可比性和比较的必要性。其次，比较要求全面，切忌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或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再次，比较要有全局观点，切忌陷入具体细节的比较而忽视了主要矛盾的比较。

鉴于比较法的上述要求，本书在写作中力求做到：第一，在

选择比较对象时注意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东亚与拉美是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货膨胀领域内的两种典型，同时，它们在现在或我们所比较的历史时期又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地区），具有发展中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第二，本书力图用客观介绍的方法，准确地反映事物的真实面目。笔者认为，尽管拉美的反通货膨胀从总体上看并不成功，但不能据此就否定其某些对策的合理性，也不能因台湾地区、韩国这方面相对比较成功，就全面肯定其一切做法。第三，笔者始终认为，从表面上看，通货膨胀仅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实际上是整个经济病症的综合反映，它不仅仅是一个货币过多问题，而是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人口与资源状况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因此，必须从全局分析入手，才能找出正确原因与对策。笔者还认为，东亚与拉美今天之所以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其首要原因是发展战略选择的差异，长期推行内向型进口替代战略使拉美国家结构性矛盾积重难返，经济效益差，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资金积累速度慢，最后被迫使用通货膨胀性融资和大举外债来筹措发展所需资金，并造成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其次是拉美以牺牲稳定来换取增长的错误做法；再次是两地在政府（当局）（本书所提及东亚地区“政府”均系“政府（当局）”，请读者注意）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中市场取向程度的差异；最后才是反通货膨胀对策上的一些失误。与前面三个原因相比，第四个原因相对来说是次要的。

# 1 章

## 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货膨胀概况

### 1.1 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的特点及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通货膨胀具有程度较严重、持续时间长、治理代价大等特点，这些特点是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条件分不开的。因此，在比较韩国、巴西等国和台湾地区的通货膨胀以前，有必要首先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的特点作一番考察。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韩国和台湾地区今天已跨入了新兴工业地区的行列，但在 60 年代还处于同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相似的经济特点，因此，它们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 1.1.1 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的特点

发展中国家，一般是指原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现在取得独立的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多数是在不

发达国家条件下建立的，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目前，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共有 100 多个，尽管它们的历史文化、资源条件、社会制度、经济结构都不一致，但仍然不同程度地具有一些共同之处。

(1) 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水平低。发展中国家（地区）由于严重缺乏资金和技术，在一些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耕地面积也很少，投入要素的组合中劳动所占的比重大，加上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并受制度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劳动生产率低下。据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发展中国家（地区）（石油输出国除外）按人均收入可以分为两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 545 美元（1988 年的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地区），共有 42 个，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加权平均数为 320 美元（其中我国和印度为 340 美元）；在 545~600 美元的国家（地区）共 54 个，加权平均数为 1930 美元。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17000 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相差分别为 52 倍和 7.8 倍。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能全面衡量一国（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2) 经济的二元结构。这是发展中各国（地区）共有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经济的二元结构是指一国（地区）经济系统中存在传统经济与非传统经济两个部分，这一特点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经济部门，尤其是工农业两大部门。发展中国家（地区）都有一些相对发达的城市和广大的落后的农村地区，城市以工业为主，生产规模较大，技术比较先进，产品主要供出售，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收入均较高；乡村则以农业为主，生产规模小，工具简单，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是自我“雇佣”的部门，在这个部门中，人口多，存在着大量的“隐蔽性失业”，即农村

中表面上也从事生产活动，但实际上是过剩的劳动力，这部分人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很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发展过程，实质上便是如何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经济增长的动态部门——工业部门中去。只有当资本积累将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经济才能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新阶段，劳动力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两部门的收入随着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而提高，部门间的收入差别消失，二元经济变成一元经济，经济发展进入典型的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

(3) 现实资本积累不足。发达国家工业化起步前就通过包括对殖民地强盗式的掠夺等途径进行过较长时间的资本原始积累，工业化起步后，资本积累规模又进一步地扩大。而发展中国家（地区）在起步时，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剥削，几乎都面临着资本匮乏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各种供给“瓶颈”中，最为突出的“瓶颈”便是资本，现实资本积累不足，是一切缺口中最大的缺口。由于缺乏资本，无力进行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缺乏，难以在国民经济中大量使用昂贵的先进设备，因此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现实资本积累不足，不仅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可供储蓄进而可供投资的资本不足，还由于缺乏现代的资本积累机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缺乏现代的金融中介机构来吸收资金，资金流入黑市，民间信用融资缺乏效率。

(4) 经济上的依附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地区）由于经济落后，独立后仍无法摆脱宗主国的控制。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中，在资金、技术、贸易等方面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依赖性，这决定了它们处于依附的地位。

(5) 人口和就业压力沉重。5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地区）人口增长率不断上升，即使到80年代中期，人口年均增长

率降到 2% 仍比发达国家的 0.6% 高 2.3 倍。人口增长过快使这些国家摆脱贫困的难度增大，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大部分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有限的资金首先被投放在缓解危及人口基本生存的某些纯消费开支上（如食品、药物、服装），这样必然挤占掉本应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高人口增长率也造成了严重的失业。据估计，发展中国家（地区）公开失业和就业不足人数差不多达到 30%。

（6）市场体制的不成熟。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还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较大的比重，市场尚未真正发育和成长起来，商品化和货币化的程度低，缺乏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健全的市场规则。

#### 1.1.2 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特点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1）二元经济所形成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和结构矛盾是产生通货膨胀的温床。前面提到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现代经济演变的过程，也即消化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初期不可避免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的消化便成为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源之一。

二元经济的特点还构成发展中国家（地区）所特有的经济结构性矛盾。传统的经济部门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生产的扩大不像现代部门那样可以随需求的增加而自动扩大，供给弹性不足，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瓶颈”或短线；而根据木桶矮板原理（短边规则），经济的增长受制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最短的短线的缓解程度，这些最短的短线一般又集中在粮食、交通、能源、基础工业等普遍需要，但又投资浩大、建设周期长的部门，短缺程度在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结果，一旦受某一个“瓶颈”所阻，全部供给能力的扩大便受阻，使总供

给的增长长期滞后于总需求的增长，通货膨胀也就成为经常性的现象。

(2) 现实资本不足使许多国家(地区)企图用通货膨胀来筹措资金。由于现实资本积累不足，又缺乏现代金融体系来动员闲置资金，为了动员资金，使用提高赋税、扩大税收范围或增发货币转借给财政的办法，介入储蓄与投资的形成过程，以为投资筹措资金。而公开直接增税招致的社会阻力很大，因此，许多国家(地区)不得不乞灵于开动印刷机，通货膨胀因之产生和加剧。由于使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强制社会公众向国家提供信用是十分隐蔽的：谁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手中的货币有多少不是流通所需要的；即使能够知道，对个人来说，虽然他可以通过支出这些货币来收回对发行银行的授信，但甲的支出会成为乙的收入，对整个社会来说，它无法摆脱这部分过多的货币。这样，通过货币贬值，使所有的货币持有者都失去一部分价值索取权。现代信用货币的这一特点，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政府的需要，许多国家(地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企图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促进经济增长。

(3) 经济基础和市场关系的脆弱使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通货膨胀程度比较严重且难以对付。经济基础薄弱，供给能力低，使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通货膨胀一旦发生，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程度比较严重。市场体制的不成熟，使运用间接的市场性调控手段来抑制通货膨胀缺乏体制条件，往往不得不较多地使用直接的行政手段，而这类手段的副作用较大，这就使反通货膨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4) 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性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地区)国际收支失衡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地区)在资金、技术上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同时影响本国出口

产品价格的能力又相当有限，使发展中国家（地区）在国际贸易中处境极为不利。一方面，进口需求难以压缩；另一方面，出口收入波动很大，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地区）经常面临国际收支失衡，进而带来进口成本上升和国内物价上涨。

## 1.2 战后台湾省通货膨胀概况

台湾面积 3.6 万平方公里，人口 2147 万（1996 年统计数），是我国的一个行政省。除了农业资源外，所需矿产品，尤其是能源（自给率仅 1% 左右）缺乏。60 年代初以前，台湾省的基本情况与同期亚洲大部分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大体相近。自 60 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来看，60 年代平均为 9.1%，70 年代是 10.2%，这样的高速发展，自然为其带来巨大变化。1952 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 196 美元，但到 1991 年已达 8815 美元，40 年中增加了 45 倍，列世界第 25 位；台湾省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从 1952 年的 16.7 亿美元跃至 1991 年的 1802.7 亿美元，增加了 100 多倍，列世界第 21 位；出口贸易额占世界出口贸易比重从 1950 年的 0.1% 上升到 2.2% 增加了 21 倍，居世界出口贸易第 21 位。

尽管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但总的来看，台湾省物价却保持相对稳定。40 多年来，除战后经济重建时期和 70 年代初、70 年代末两次石油危机期间曾发生过三次严重通货膨胀外，其余时间物价仍能维持相当平稳的局面，这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中是不多见的。

下面分别介绍战后台湾省主要的三次通货膨胀的概况。

### 1.2.1 战后重建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

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省即遇到恶性通货膨胀。1945~1948年间,物价上涨了10倍,到了1949年末,价格竟暴涨了30多倍(见表1.1)。

表 1.1. 1945~1960年台湾地区通货膨胀率 单位:%

年 份	批发物价年增率	年 份	批发物价年增率
1945年12月	100	1953	8.80
1946年12月	197.62	1954	2.35
1947年12月	676.80	1955	14.11
1948年12月	1044.59	1956	12.69
1949年12月	3406.00	1957	7.23
1950年12月	305.56	1958	1.39
1951年12月	66.01	1959	10.25
1952年12月	23.10	1960	14.16

资料来源:

成嘉玲. 我国经济的发展. 台湾:世界书局, 1971, 第212、215、223页。  
台湾银行季刊, 36卷4期, 1985年12月, 42卷2期, 1991年6月。

③金融统计月报, 1990(2)。

以上转引自:王家骥,付敏. 台湾金融与经济发展.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4, 第203、205页。

易纲,许小年. 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改革.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 第256页。

说明:1945~1948年为旧台币时期, 1949~1952年为币制改革初期。

这次通货膨胀的原因可从远、近两方面来看。远的方面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占领下的台湾省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物资匮乏,光复时,工业产量不及光复前最高产量的

1/3，农业生产仅及 1937 年正常产量的 48%。另外，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亦波及到台湾省，由于法币的币值被高估，结果大量的资金流向台湾省，扩大了市场上的需求，1948 年台湾省从大陆的资本净输入额是当年台币发行额的 2 倍。从近的方面看，国民党溃逃到台湾省后，人口由 1945 年的 500 万猛增到 1950 年的 750 万（尚未包括军队人数），由于军事与行政开支的沉重负担和恢复经济的迫切需要，财政压力很大，预算难以平衡，赤字累累，财政支出有 80% 以上依靠台币发行，以致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1949~1952 年，台湾省货币供应量每年增长 7%，由财政赤字造成货币供应量猛增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面对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的不利形势，国民党当局为求立脚和生存，不得不竭尽全力对付通货膨胀。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币制改革，存款优惠利率和平衡财政预算。

(1) 币制改革。1949 年 6 月 15 日，台湾金融当局发布关于发行新台币、收回旧台币的条例。新台币以 100% 的黄金、白银、外汇和可换取外汇的物资作发行准备，最高发行额为 2 亿元。为了建立人民对新台币的信心，在币制改革的同时，还抛售黄金、外汇。但由于巨额的财政赤字未消除，新台币发行额不久即被突破，1950 年底，新台币发行量增至 5.84 亿元，当局被迫宣布取消最高发行限额。总之，新台币的发行，虽然减轻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一些恐惧心理，但并未收到稳定经济的效果。

(2) 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鉴于币制改革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台湾银行于 1950 年 3 月发布条例，开办存期短而利率高的优利储蓄存款。由于当时通货膨胀严重，一般存款期限都很短，因此优利存款期限亦不可能太长，一个月期优利存款月利 7%，按复利计算，折合年息 125%。4 月又续办三个月的优利

存款月利率为 9%。这项优利存款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实行仅三个月，银行定期存款就从 600 万元上升到 2800 万元，8 个月后又增至 3500 万元，占整个货币供应量的 7%。1950 年第一季度通货膨胀率月平均高达 10.3%，到第二季度就降到 4%。

在存款利率提高的同时，贷款利率仍维持原来水平。为避免吸储银行亏损，台湾当局同时制定了转存款办法，规定各商业银行吸收的优利存款，如超过其有利的放款与投资，可将超额部分按与优利存款相同或更高的利率，转存于台湾银行。而台湾银行用于贴补转存款的利息，则用存于该行的美援相对基金存款的收益来弥补。同时还规定优利存款可申请免交存款准备金。各银行头寸如因举办优利存款而受影响，可向台湾银行拆借。

随着物价回落，台湾银行于 1950 年 7 月将存款利率调低一半，即月息 3.5%，但物价旋即反弹，1951 年 1 月，优利存款总额降到 2100 万元，于是只好于 1951 年 3 月，又提高到 4.2%，并陆续开办了六个月和一年期的优利存款。吸取这一教训，当局以后对调低利率都持谨慎态度。调整的幅度较小，逐步到位，以防形成人们的不良预期。到 1951 年底，优利存款已占货币供应额的 34.2%，物价上涨趋势已变缓和。

(3) 平衡财政收支。为消灭财政赤字，台湾当局一方面大力开辟财源，除了将美援的一部分用来弥补财政赤字，还大力劝募“爱国公债”，开征间接税、防卫捐，厉行公营企业盈利上交国库政策，1949~1951 年，公营企业上交国库的利润占其总盈利的 45%。另一方面对军公教人员实施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度。

除了以上三项主要措施，台湾当局还于 1951 年 4 月实行外汇制度改革。将汇率调整到接近均衡水平，并采用复汇率制，使出口商品适用于比进口低的汇率，在进口商品中，机器设备和

原料的汇率又比其他商品低，目的在于奖出限入，将有限的外汇资源更多地投入生产性用途。但外汇改革后，新台币的币值仍存在高估现象，进口申请仍极踊跃，于是台湾当局又公布预缴进口保证金制度，凡进口申请者须将与所申请外汇等值的新台币存入台湾银行，这样既抑制了进口需求，又使巨额资金被冻结起来不能动用，显然，这一规定有助于遏制通货膨胀。

上述三项对策虽然在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毕竟属于治标的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增加供给。1952年经济形势渐趋稳定，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以后，台湾当局即将反通货膨胀的重点转到刺激供给增长上，这一时期推行的两项重要经济政策，被公认为奠定了日后经济起飞的基石，这就是土地改革和第一个四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实施。前者促进了财富和国民收入的均匀分配，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后者则扩大了工农业生产规模。从1953~1968年，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达5.2%。1968年稻米产量达251.8万吨，较1952年的157万吨增长60.38%。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稳定物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加工出口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1952~1954年3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1%，物资供应较前充分，物价变动幅度逐渐缩小。综观这一阶段的价格形势，批发物价年均增长10.28%，消费物价年均增长12.17%，已较前一阶段大大降低。但50年代大多数年份的财政收支仍不能平衡，将美援计入财政收入后，9年中仍有5年赤字（赤字为国民生产总值0.13%，占财政支出1.03%）。货币供应量虽严格控制，年增长率仍高达23.34%<sup>①</sup>。总之，通货膨胀的阴影仍未完全驱除，整个经济基础仍属薄弱。

### 1.2.2 70年代的两次通货膨胀

整个60年代是台湾省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经济